

# 先秦解经文体论略

## ——兼论简帛《五行》篇的文体定名

高新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济南 250100)

**摘要:** 经与解经文体是与私家著述相伴而生的, 先秦诸子中的解经文体目前仅见经解、经说二种。经解体可能是师徒授受的讲义或记录, 经与解应非一人一时之作; 经说体之“说”是作者为使经文浅显易晓, 与“经”同时所作, 这在诸子时代成为一种常见的著述方式。学界对近出简帛《五行》经和解经两部分文体的命名或有不妥, 其经文部分是一种可称为“前解经体”的文体, 解经部分则应循先秦诸子之通例, 名为“经解体”, 而非当今学界通常所说的“经说体”。

**关键词:** 文体; 《五行》; 经解; 经说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3)06-

文体的辨析, 自来是传统文学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两汉以降, 六朝尤重此学, 至明清而不衰。文体辨析不惟对古人来讲有益于指导写作, 对今人而言更“能振叶以寻根, 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序志》), 使我们明晰古代各体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文体之源起, 历来论者莫不溯秦汉而上之, 尤喜溯源六经<sup>①</sup>。文体之析源分流, 固当踪溯两周, 遥追三代, 清人章学诚已言之, 曰: “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 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 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然探赜索隐, 详而论之者, 迄无其人。后学疏浅, 力不能综论, 今仅就解经文体在先秦之演进一事, 略陈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抛此一砖, 庶几有引玉之功, 则幸甚矣。

**收稿日期:** 2013-08-16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青年项目“出土文献与先秦著述史研究”(批准号: 13CZW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并获得“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资助(资助编号: IFYT12003)。

**作者简介:** 高新华(1977-), 男, 山东邹平人。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学博士, 现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sup>①</sup> 如《文心雕龙·宗经》云: “论说辞序, 则《易》统其首; 诏策章奏, 则《书》发其源; 赋颂歌赞, 则《诗》立其本; 铭诔箴祝, 则《礼》总其端; 记传盟檄, 则《春秋》为根; 并穷高以树表, 极远以启疆, 所以百家腾跃, 终入环内者也。”又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言: “夫文章之体, 起于《诗》、《书》……厥后颜氏(名之推)推论, 凡文各本五经, 良有见也。”

---

## 一 经与解经文体的产生

文体溯源常以宗经为说，虽多牵强附会，然其路数，实为正途。盖六经不惟儒家经典，实乃中华文化最早之成文典籍，其在先秦，固亦百家共有之知识渊薮，韵、散之分，经、传之起，荦荦大端，莫不肇始于六经。早期篇什，即便汇编成书，亦多无书名，六经之名，本皆类名<sup>①</sup>；其篇名则多拈篇首之语以为称，略如今日电脑自动生成之文件名<sup>②</sup>。而六经之中，唯《诗》、《书》以文体为名，且《尚书》竟略具典、谟、诰、命、训、誓之体，于篇题中已赫然标示，文体肇端，莫先乎此。诚然，《尚书》六体无非是统治者在不同场合的谈话方式，其篇题即于此讲话方式前加上相关人名、地名或事名而已，故其命名方式，与六经汇编之以类相从大同而小异。

六经是官守之学的结晶，正如章学诚所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sup>③</sup>春秋晚期开始，进入诸子百家的私家著述时代。诸子著述在诸多方面继承了官学时代的做法，有不少著作本身就是记言记事之作，比如《论语》。然而正是在此时，不仅儒家学者把官学之六种奉为六经，百家还在制造着各自的经典，如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经》，《管子》中的《经言》各篇即是。实则儒家亦不乏此类作品。《孝经》已以经名，而《大学》、《中庸》，自朱熹《集注》已认为是首章为经、余者为传。

“经”名的出现是以私学的产生为前提的，而“传”等解经之作更与私学时代的师徒授受紧密相关。大致说来，经、传之产生是与私学兴起相伴的，在私学师生授受过程中需要对已有的官学教本进行解释阐发，遂有传的产生；而原有之官学典常被尊为经。“官司典常为经，而师儒讲习为传”<sup>④</sup>，似是经、传最初的情形。后来私学各家乃至方术杂学各自尊奉自己所传习之经典为“经”，且在传习中出现解经之作。而百家蜂起，遂曰稍后于儒家，但诸子著书的“兴致”似乎远过于“述而不作”的夫子家法。因此，先秦诸子中不仅出现了不少自名为“经”的作品，而且出现了各式各样解经的文体式样。

据《汉志》，解经文体于传之外，尚有记、说、解、故、微、章句、解故、

---

<sup>①</sup>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sup>②</sup> 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sup>③</sup>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原道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页。

<sup>④</sup>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原道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杂记等等，然皆汉代经师之作，为经学昌明时代特有之现象。诸子中自题经解的体裁，除了《汉志》所录《老子邻氏经传》以“传”为名但已失传而外，实仅“解”、“说”二体而已。今所见诸子著作之解经文体亦与此相符，如《墨子》中有《经》和《经说》；《管子》中《牧民》、《形势》、《立政》、《版法》、《明法》诸篇皆有“解”，《宙合》、《心术上》篇前后自为经解，《心术下》则被认为是《内业》之“解”<sup>①</sup>，《幼官》（《玄宫》？）或即《幼官图》（《玄宫图》？）之“解”；《韩非子》之《内、外储说》则自为经、说，《解老》、《喻老》也是以《老子》为经典而作出的解释。这些是显见于诸子书中者<sup>②</sup>。此说、解二体不仅与汉代儒家经师传经之体有别，彼此之间亦有不同。

## 二 经解、经说体的文体特征

“解”字的本义，《说文解字》中说：“判也。从刀，判牛角。”甲骨文作“”，《甲骨文字典》的解释是：“从角从从牛，像以手解牛角之形。”并认为《说文》之从刀是从之讹<sup>③</sup>。由解牛角引申为分、判，再引申为分析使晓悟之义，即解释、解说。“说”字在甲骨、金文中尚未出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说，说释也，从言兑声。一曰谈说。”段注：“说释即悦怿。……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是段玉裁认为开解乃“说”之本义，喜悦反为引申义，所以他认为“一曰谈说”四字“疑后增”<sup>④</sup>。杨树达观点与段氏大致相同，并谓“言之锐利者谓之说，古人所谓利口，今人所谓言辞犀利者也”，又比较谈说、议论之别曰：“大抵谈说者，言之慷慨激昂者也，而议论则朴实说理者也。”<sup>⑤</sup>。马叙伦引惠栋说，认为“说释”乃“说解”之误，而马氏本人认为“说为兑之后起字，从音，

<sup>①</sup>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78页。何如璋以《心术下》为《内业解》，吴汝纶亦以此篇与《内业》相出入，而黎翔凤认为二者各自成文，非“解”亦非散简。按：《心术下》之文字多是对《内业》中重要观点的解释，二者不可能毫无关联，即使非“解”，也是关系紧密的，视之为《内业解》亦不为过。

<sup>②</sup> 《吕览·有始览》七篇之末皆有“解在乎某某”，形式很像《韩非子·内外储说》、《墨子·经说》，后文有相应的解说，皆故事传说，此点与《内外储说》尤其相似，只是散在其他《七览》和《六论》中，并非集中的说解，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吕览》的这种文体格式显然是学自《墨子》、《韩非子》等书，但其故事传说在《有始览》之外的篇章中自有其地位和作用，与《墨子》、《韩非子》等专门解说经文的文字有别，似是未免重复采取的方法，更类《史记》的“互见法”，因此本文不把《吕览》的此种情况视为解经体。

<sup>③</sup>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81页。

<sup>④</sup>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sup>⑤</sup>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7页。

---

兑声，喜而发音也”<sup>①</sup>。按：“说”的确为兑之后起字，以悦为其本义是对的，但对其说明、解说之义的阐释，杨氏的观点还是可取的。

在对“经”进行解释的文体层面上的含义，“解”和“说”可能也有所区别。对此问题的探讨，必须以一定的文本作为基础，然而传世文献中名为“经解”和“经说”的著作非常之少，故只可窥其一斑，是否即为定论，还须进一步检验。兹略陈鄙见于下。

以“解”为题的文献，除《管子解》和《韩非子·解老》外，《汉志》著录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六艺略》尚书类序云：“《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大约“解故”二字之义即解诂，亦即所谓“解古今语”，所重在名物训诂，与先秦诸子中的“解”类文字恐异。又，《数术略·五行类》著录《文解六甲》十八卷、《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其书亦佚，张舜徽“疑为古代用文辞解释专用名词之书”<sup>②</sup>，是否如此亦难断言。总之，要了解“解”的含义恐怕只能靠《管子解》和《韩非子·解老》两种而已。

以“说”为题的文献，先秦诸子中现存亦仅《墨子·经说》、《韩非子·内外储说》两种，赵岐《孟子题辞》言孟子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说》不知内容如何，似非“经说”之体；《汉志》小说家类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大概亦是《虞初周说》之类，乃小说家巷语丛谈，又非为“经”而作，亦不足据。然而以“说”为题而近小说者，尚有《韩非子·说林》、《内、外储说》，刘向的《说苑》，《世说》等等，综合来看，似乎凡“说”之类，皆有浅显（常以故事说理）、不甚严肃（小说）而令人喜闻乐见之倾向，此种倾向亦可视为多数“说”类文体的一个基本特征。

汉代经学发达，解经之作繁夥，故以“说”为名者较多，《诗》类有《鲁说》、《韩说》，《礼》类有《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类有《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孝经》类有《长孙氏说》、《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等，这些书皆已久佚，从文献记载和后人辑佚来看，有些是后学整理的先师遗说，有些为本人亲著。前者如《韩诗说》，王先谦曰：

---

<sup>①</sup>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五，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据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第59页。  
<sup>②</sup>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4页。

“《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此其徒众所传。”<sup>①</sup>此说大致是不错的。张舜徽以为与《鲁说》同体，也应该是对的，只是他在解释“说”体时云：“说亦汉人注述之一体。《汉书·河间献王传》云：‘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是传、说、记三者，固与经相辅而行甚早。说之为书，盖以称说大义为归，与夫注家徒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者，固有不同。”<sup>②</sup>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马国翰辑有《韩诗说》九条，反以循经立解、训诂名物为主，如第一条“我姑酌彼金罍”，《韩说》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饰，诸侯大夫以金饰，士以梓无饰。”<sup>③</sup>王仁俊辑有韦玄成《鲁诗韦氏说》一条，不足以窥其一斑，《礼》类二种皆已全佚。东汉彭汪有《左氏奇说》，《经典释文序录》说：“汝南彭汪，记先师奇说及旧注。”<sup>④</sup>亦先师遗说之类。本人亲著之作以《论语》、《孝经》类居多，王先谦在《齐说》条下注云：“下云传《齐论》者，惟王阳名家。《王吉传》云‘王阳说《论语》，即此《齐说》也。’然《王吉传》仅说他“以《诗》、《论语》教授”，此《齐说》是否王吉亲著实不可论定；《夏侯胜传》则言胜“受诏撰《尚书》、《论语说》”，《汉书·儒林传》亦载“江公著《孝经说》”，足证《论语》、《孝经》二者之“说”特多亲著之作。诸说皆佚，《玉函山房辑佚书》虽然偶有辑本，但或不足信，或过于简短，皆不足为据。

综合以上两类来看，汉代经师之“说”经，恐怕与先秦诸子之“经说”有异。汉经师之“说”经，主讲说经义、一家之言之谓。上述先师遗说如此，本人亲著亦如此，较明显的是《孝经》，班固自注：“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接着著录四家之《说》，即四家之义也。桓谭《新论·正经篇》载：“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sup>⑤</sup>故《汉书·儒林传赞》批评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艺文志》又谓：“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如此不惮其烦地解说经义，亦与前引张舜徽所说的“以称说大义为归”远

<sup>①</sup> 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16页。

<sup>②</sup>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9页。

<sup>③</sup>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530页。

<sup>④</sup>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2页。

<sup>⑤</sup> 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页。朱谦之校：“当从《汉书·儒林传》作秦延君，近为延字之形讹。”

不相牟。上述说法皆表明两汉经师的“说”经，乃讲说经义、一家之言之谓。

先秦诸子之“经解”、“经说”之间含义则自有分别。观《管子解》、《韩非子·解老》，莫不详为解释，且明显有讲授学问的痕迹，似为师生授学的讲义。兹举数例如下：

经文	解文
《形势》：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形势解》：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立政》：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立政九败解》：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治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彫，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竟之士修，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
《版法》：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僂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版法解》：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僂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明法》：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明法解》：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故《明法》曰：“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
《德经》第一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解老》：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若仅据《管子》、《韩非子》的有限资料来看，“经解”这种文体的特点非常明显：

（一）逐字逐句地详细解说经义；（二）不重字义训诂；（三）颇多引申发挥，实属一家之言，上举《形势》、《明法》二例尤为明显；（四）在形式上往往在一段解经文字之末以“故曰”引出所解经文；（五）“解”文很像老师授课的记录或讲义，故与“经”的作者和时代可能不统一。

先秦诸子的“经说”之例，亦仅《墨子·经说》、《韩非子·内外储说》两种，今亦据其实例分析其特征于下：

经文	说文
----	----

《墨子·经上》：义，利也。	《经说上》：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利之，不必用。 <sup>①</sup>
《墨子·经下》：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经说下》：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 <sup>②</sup>
《内储说上》 <sup>③</sup>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是以明主……察一市之患。	<p>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一人不能壅也，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炀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p> <p>……</p> <p>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去魏也远于市，议臣者过于三人，愿王察之。”庞恭从邯郸反，竟不得见。</p>

《墨子》的《经》和《经说》虽然文词古奥，且多错讹，十分难读，然而参以《内外储说》，亦可窥见“经说”的文体特征：（一）非详解经文，而是重点说明；（二）“经”皆简短，大都仅仅表露观点，如果没有“说”，读者很难理解“经”的确切含义，所以“经”、“说”是相辅相成的；（三）在形式上“经”文中多有“说在”之语，提醒读者“说”文的内容或关键；（四）由二、三两条推断，“经”、“说”的作者和时代多数应该是统一的；（五）《墨子》的《经说上》多为字词概念的阐释，格式亦与《经说下》、《内外储说》不同，无“说在”字眼的提示，不宜论断其经、说的作者和时代问题<sup>④</sup>；（六）《韩非子·内外储说》采用了以故事解说经文的方式，符合上文所指出的“说”类文字浅显、不甚严肃的特点。

<sup>①</sup> 在孔孟提出义利之辨之前，古人对义、利的看法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左传》有“利者义之和”、“义，利之本也”、“义者利之宜”等说法，《国语》、《吕览》类似说法也不少。《墨子》以利释义，体现的含义与此相通。芬通分，界也；能，善也。《经说》的大意是，义是以天下万民为目标的，并能够为之很好地带来利益，而不一定居于高位。参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82页。

<sup>②</sup> 五行相生相胜之说由来已久，战国时非常流行。然而《孙子兵法·虚实》已提出“五行无常胜”之说。《经说下》的解释大意是，水能胜火，然而火上若架一锅水，有锅的隔离，水尽而火燃；火能铄金，但若以多金压一炭火，火亦熄灭；金可以劈木，火可以燃木，而以木击木亦可令折，岂可谓木胜木？五行者，就如麋鹿游山、沉鱼在渊，各适其性，各得其宜，本无所谓相胜与否。参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72页。

<sup>③</sup> 《内外储说》之文例大同，不烦多举。

<sup>④</sup> 《墨子》的《经》、《经说》情况较为复杂，研究者的认识也难统一，《经》、《经说》之先后，《经》上下、《经说》上下之先后，以及哪些出自墨子、哪些出于三墨及其后学，都是有争论的。笔者大致同意吴毓江的看法，认为《经上》、《经说上》似时代较早，或与墨子本人有关联；《经下》、《经说下》较晚，可能稍早于公孙龙。而吴谓《经》与《经说》同时产生，笔者则认为《经说》上、下的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诸说参见吴毓江：《墨子各篇真伪考》//《墨子校注》附录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15-1027页；谭戒甫：《墨辩发微·墨经证义》，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6-14页。

---

由以上分析可知，汉代以后的经师“说”经之体，与先秦诸子中的“经说”已大异其趣。经师说经之“说”，为解说儒家经典的一家之言；而先秦诸子的“经说”，“经”与“说”相辅而行，实为一种阐发自己观点的特殊著述方式。相反，诸子中的“经解”乃学派内部师徒传习中所形成的文体，与儒家经学中的传、说、故、微等在性质上倒是更相近些<sup>①</sup>。

由此来考察诸子中未以“解”、“说”标目而具有解经性质的篇章，即可大致判断其为“经解”还是“经说”。比如，《管子》之《宙合》、《心术上》篇前后自为经解，不仅逐句解说经义，而且有所引申发挥，且有“故曰”的字眼，其为师生传授讲习之作无疑，与其他《管子解》性质完全相同，故亦可定为“经解”作品。《心术下》与《内业》关系密切，极可能本是《内业解》，但散失严重、前后错乱，已非本来面目。

《韩非子》之《喻老》是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解释《老子》经文的著作，体例较为特殊，介于《解老》和《内外储说》之间，形式类似《解老》而性质更接近《内外储说》，与《韩诗外传》相似。“喻”即比喻之义，即以较为具体形象之事物来说明较为抽象的道理，这与上文提到的“说”类文体具有浅显、不甚严肃的倾向大致相符，故定以为“经说体”似更合适。刘向有《老子说》，可能与《喻老》篇相近。

诚然，因为文献资料的限制，上述结论是否完全符合古书体例，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或新发现文献的验证。但就现有资料而言，以上论断至少是持之有故的。

可喜的是，1973年和1993年分别于马王堆汉墓、郭店楚墓中发现了简帛两种《五行》篇，且都与经和经解文体关系密切，为我们讨论此类文体提供了原始材料。

### 三 当前学界对《五行》篇文体的认识及存在的问题

简帛两种《五行》令学界为之振奋，研究著作也是数以百计。《五行》篇的文体比较特殊，特别是帛书《五行》包括前后两部分，后一部分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说明。帛书本与竹简本相同的部分通常被称作“经”，而解释经文的部分自

---

<sup>①</sup> 《吕览·有始览》的“解在乎某某”之“解”，只是采用了类似解经体的格式，既非解经之体，其“解”字亦仅用其解释说明之义而已，与本文所论“经解”、“经说”二体之别无关。



---

庞朴以来即被称作“说”<sup>①</sup>；至于“经”的部分，陈来撰文以为前半、后半自为“经”、“解”<sup>②</sup>。

陈来将《五行》前半视为经、后半视为解并按自己的理解重新分章的做法，是“仿朱子《大学章句》”而作。但朱熹的《大学章句》是以第一章为“经”，后面十章为“传”，而不是“解”。另一方面，陈来的章句分配显得较为随意，如将原来的28章重新划分为32章，《上经》、《下解》各16章，并各自分为3个段落；然而上、下两部分并不能相互对应，《上经》的前4章、5至9章、10至16章各为一段落，《下解》的前5章为一段落，但这5章对应的是《上经》的前5章和第13章，《下解》6至11章为一段落，对应的是《上经》第12至14章，《下解》第12至16章则未明示对应《上经》哪一章，只言释君子之道，及发君子慎独、君子有德之意，对照《上经》，则主要是对应第4、9、10、11各章。如此看来，《下解》与《上经》既难一一对应，则《五行》篇不似《大学》那样整饬可名为“经传”，是否这是陈来先生称之为“经解”的原因之一呢？

《五行》篇“经”的部分，的确如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其前后章节之间存在自我解释的性质。日本学者浅野裕一在《帛书〈五行篇〉的思想史位置》一文中指出，帛书《五行》的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经文是由后面的第十四至十九章经文来解说的，从内容上看，这样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不宁唯是，《五行》篇不止存在后半解释前半的现象，前半的一些章节间也具备“经解”的性质，即第3章后半为经：“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德。”第4、5、6、7章为解，或总说、或分说思之不精、不长、不轻和仁、智、圣等相对应的种种情况<sup>③</sup>。对于浅野的观点，池田知久指出：“这种情况不局限于意味着原本经性质的部分和说性质的部分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写作成书的，相反，这意味着即使是写一般的文章，通过说性质的部分来解说经的部分，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叙述方式。”池田氏并进一步举《墨子》经和经说、《韩

---

<sup>①</sup>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第65页。按：庞先生认为：“按当时的习惯说法，这第一部分叫《经》，或有一个切合内容的题目某某；第二部分叫《说》，或者叫《某某解》。”可见他并没有特别留意说、解二者的区别，但在具体讨论时都以“说”来指称第二部分，故后来的讨论者受其影响也称第二部分为“说”。

<sup>②</sup> 陈来：《竹简〈五行〉章句简注——竹简〈五行〉分经解论》，《孔子研究》2007年第3期。徐少华亦以《五行》篇经文部分的自我解说为“经解”关系，但未展开论述，详见徐少华：《楚简与帛书〈五行〉篇章结构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sup>③</sup> 此处章节、文字据李零校注郭店简本《五行》，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马王堆帛书本分章、文字略异。

---

非子》的《内外储说》的经和说、《管子》的《经言》和《管子解》为例，认为“这种以相应的经性质的内容和说性质的内容结合起来讲述思想家自己思想的做法，成为这一时代学术界常见的一种基本的叙述形式”<sup>①</sup>。虽然池田并不同意浅野裕一的观点，而是认为《五行》前后两部分作者在设置和意图上有所不同，并非简单的经和说的关系；但他自己则认为帛书《五行》中说的部分，有的地方采取了说中进一步设说的形式，比如其书第七章说注 f、第二十章说注 h、第二十一章说注 d 中，他都作出了这样的说明，这些皆可论证其自为经说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基本叙述方式的观点<sup>②</sup>。

池田氏的见解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补充的是：（一）《五行》篇的经文的确如不少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其中有着自为经解的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解说文字与“经”文的义涵有着细微差别本不足怪，然而其解“经”的性质不能因此受到质疑。（二）池田强调了经、说为同一个作者在同一时段内写成的可能性，并认为这种叙述方式成为思想家论说的基本方式。但他没有注意《五行》的“经”和“说”两个部分的区别，事实上，“经”的自我解释和“说”对它的解释应该是出于不同作者的，其性质显然有着本质不同。

《五行》篇经部分的文体特征，正如池田氏所说，是“以相应的经性质的内容和说性质的内容结合起来讲述思想家自己思想的做法”，是某位思想家在同一时间段内写就的作品，而不是由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创作的。

帛书《五行》“说”部分之被名为“说”，研究者在命名时似乎对“经解”、“经说”、“经传”等概念的异同缺乏深入考察。首先提出帛书《五行》分“经”、“说”的是庞朴，他起初并没有区分“说”、“解”之别，后来虽然意识到“同为‘经’‘说’，有著者自说与他人补说之分，不能不分辨清楚”<sup>③</sup>，但仍没有分辨“说”、“解”之间的差异。后来的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承庞朴之说，将《五行》后半解经文字称为“说”。只有李学勤曾经提出：“《五行》和《大学》一样，是一篇经、传相结合的作品。”<sup>④</sup>似乎要把解经部分定名为“传”，但在其文章中有

---

<sup>①</sup> 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41页。

<sup>②</sup> 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注16、17。

<sup>③</sup> 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223页。

<sup>④</sup> 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49页。笔者按：不少学者将《五行》与《大学》的文体相比附，除李学勤和上文提到的陈来仿《大学章句》将《五行》经文析为

---

时名“传”，有时又名“说”，实际上也没有对这些概念加以刻意区分。李氏还说：“现在仔细考虑，我以《墨子》、《管子》等书来对比《五行》，虽能说明当时有经与说、解的存在，尚有未达一间之处。因为《墨子》等书的经和说、解，各各分立，自成起讫，而帛书《五行》则经、说前后联贯，体裁有所不同。”<sup>①</sup>此说亦难成立。首先，《五行》篇的解经部分在经文之后，二者也是各各分立的，从图版可以清晰地看出，不仅解经部分另行书写，而且有所标识；第二，《五行》篇虽然没有“经”、“解”或“说”的题名，这也许是因帛书残损致阙，或者抄写者将题名漏掉亦未可知，因为解经部分是从第六章的后半开始解释的，这让所有研究者不得不认为是抄写者有所遗漏；第三，虽然《大学》也是采用了类似的解经文体，但《大学》的经文极短，传文是一章解释一个词或一句话，而《五行》篇却是每一章解释文字对应一章经文，反倒是与《大学》有所不同了。

倒是池田知久在这方面的意见较为客观，他说：“如说文中的‘酉下子’和‘孔子’的故事一样，在证明经文的命题的正确性的实例上而举出故事，是接近于《韩非子》的故事学构成的形式（参见《喻老》等）；而且随经文一字一句附上说文，则是接近于《管子》的解的诸篇的形式（参见《心术上》、《形势解》等）。然而相对于《韩非子》和《管子》多冠以‘故曰’而引用必须加以解说的经文的情况本篇有所不同，这似乎可以说是开创了新的经学形式的。”与多数学者的意见不同的是，池田知久认为“（经和说）写作年代不会相距很远，毋宁说可以认为是由同一人物或属同一学派的人物在大致同一年代写成的东西”<sup>②</sup>。不过，在作者和时代问题上，笔者还是倾向于庞朴的意见，他说：“帛书《五行》篇的‘经’和‘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计划下的两个部份。这一来由于，‘经’文说理清楚，自我圆满，无须多加解说，也没有为‘说’文有意留下什么；二来也由于，‘说’文虽然逐句解说，并没有说出什么新思想来，相反倒表现得十分拘谨，乏善可陈。因此我设想，《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

---

经、解外，早在马王堆帛书消息发布之时，韩中民就说《五行》篇“文体与《大学》相近”。详见韩中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第9期。此外，刘信芳主张将《五行》篇“经”部分的解释性文字命名为“说”，而将帛书解经文字的部分命名为“传”，这样，一篇《五行》就包括了经、说、传三种文体。但他并未解释如此划分、命名的理由。见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0年。

<sup>①</sup> 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48页。

<sup>②</sup> 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注14。在第七章经、说的注解中，池田认为说对经有相当的补充意义，也是他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见该书第188页注f。

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sup>①</sup>《五行》篇本无“说”、“解”是极显然的事，否则在经的部分就不会存在自我解说的现象了；再者，经文与解经文字多有有用字上的不同，也可证二者非出一手，如经文“愬”，解经文中作“𠵽”；经文“𦉳”，解经文作“變”；经文“简”，解经文作“间”，等等。因此，《五行》之“经”部分的自我解释现象必须同“说”部分对“经”的解释分开来对待，换言之，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 四 《五行》篇的文体命名

结合前文对经解、经说两种文体的考证，再来分析《五行》篇经和解经两部分究宜名为何种文体，就比较容易了。

《五行》篇经的部分各章之间有的存在解释关系，但与前述经解、经说二体皆有明显区别。这是作者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思想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是对自身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尚不能以“文体”视之，最多可以说是一种观点阐述式的“前解经体”<sup>②</sup>。

至于其解经部分，逐条比照上文总结的“解”、“说”两种文体特征，我们不妨认为它更宜名为“解”：

（一）逐字逐句地详细解说经义，“经”的每一句话都有解释。

（二）不重字义训诂。虽然很多字词的解经采用了“××者，××也”的格式，但正如池田知久所说，“‘轻者，尚矣’，并不是论述‘轻’在字义上的训诂，而是给予价值性的评价或是思想上的定义”<sup>③</sup>。

（三）解释经义较少引申发挥，非常忠实于经文。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经

<sup>①</sup> 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20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sup>②</sup> 此种体例产生可能较早，如《尚书·皋陶谟》：“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又如《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郕鼎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啻，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紕、紃、紕、紕，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厉、游、纓，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旗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显然“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可视为“经”语，下面分别从俭、度、数、文、物、声、明七个方面加以阐述，即是对“经”的解说。但这仅是一种谈话技巧，即先亮出观点，然后对观点进行详密的阐发，而不能视为一种文体，故本文权称之为“前解经体”。

<sup>③</sup> 池田知久著、王启发译：《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北京：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注b。

---

文本身已经讲得比较清楚，而解经者个人又是一位拘守师说的儒者。守师说、重家法的汉代经学传统应该是由来已久的，儒家与其他诸子的一个显著不同，便是“述而不作”，本篇与《管》、《韩》在这方面的差异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在形式上没有像《管子解》、《韩非子·解老》那样以“故曰”引出所解经文，而是先对每句经文直接复述，然后以“××者，××也”的格式对重点词句加以解释，或者以“言××也”的格式概述经文大义。考虑到早期的文章本无一定之规，有些非关键性的特征容或有所变通，本篇的解经方式与《管子》、《韩非子》有所不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很像学派内后学讲习的记录或讲义，故与“经”的作者和时代可能不统一。

正如前文所总结的那样，在《墨子》、《韩非子》的“经说”类篇章中，“说”文多是重点说明而非逐句解释，且经、说相互补充、浑然一体，为同一作者在同一时间段内所完成，这些特征《五行》篇的解经部分都不具备，所以名之为“说”是缺乏文献依据的。至于池田知久说的“酉下子”和“孔子”等接近于《韩非子》的故事学构成形式，不但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而且在文中仅一两句话，并没有展开，从全部解经部分来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综上，由于对先秦解经文体缺乏深入考察，当今学界对《五行》文体上的诸多说法多有不妥。《五行》篇的文体格式在先秦时期是非常流行的，至少自西周到春秋时期，各种形式的“前解经体”就已存在；战国时期，在诸子的著作中出现了自题为“经解”、“经说”的两类文体，二者之间是存在一些区别的：“经解”似为师徒授受的讲义或笔录，恐非一人一时之作；“经说”则可能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著述方式，经与说应是同一作者的一时之作，“说”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自己的“经”，使之浅显易晓。据此，《五行》篇的经文部分是一种观点阐述式的“前解经体”；解经部分是诸子时代十分流行的“经解体”，而不是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的“经说体”。

##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Classical Annotations' Style in Pre-Qin Dynasty**

### **——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Style of *Wuxing***

**Gao Xinhua**

---

**(School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style of the classics and their annotations accompanied personal writings. The masters' classical annotations in pre-Qin dynasty only showed "classics explanations" and "classics narrations". And there were muc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Now the bamboo and silk book *Wuxing* can be divided into classic and its annotation. The former was a "pre-annotation" style, and the latter was "classics explanations" but not "classics narrations", as most academic members called it.

**Key words:** literary style, *Wuxing*, classics narrations, classics explanations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